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重访
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约瑟夫·托宾　薛　烨　唐泽真弓◎著
朱家雄　薛　烨◎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访

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约瑟夫·托宾　薛　烨　唐泽真弓◎著
朱家雄　薛　烨◎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Joseph Tobin, Yeh Hsueh and Mayumi Karasawa
Copyright © 200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9-22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美）托宾，薛烨，（日）唐泽真弓著；朱家雄，薛烨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75-2124-7

Ⅰ.①重… Ⅱ.①托… ②薛… ③唐… ④朱… Ⅲ.①学前教育—研究—美国 ②学前教育—研究—中国 ③学前教育—研究—日本 Ⅳ.①G619.712 ②G619.2 ③G61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8883 号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著　　者　约瑟夫·托宾　薛烨　唐泽真弓
译　　者　朱家雄　薛烨
项目编辑　施煜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李美娜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124-7/G·7399
定　　价　3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序一

2010年度环太平洋学前教育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我国杭州市召开。记得那时，在选择会议的主题报告发言人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三位作者托宾、薛烨和唐泽真弓；记得那时，我还想做的事情是，在这个盛大的国际会议上为这本著作的中文版举行首发式，因为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会对我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后来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将后者拖下了。

1987年，美国人类学家托宾等人曾经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进行过比较研究，1989年，研究成果以题为《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著作发表，在国际范围内的学前教育界曾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2003年，托宾等人再度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中的托幼机构的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正如托宾所讲，这次研究的重要起因之一，是在这十几年里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期望知道中国的幼儿教育实践是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曾协助托宾等人在中国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先观看了他们2003年在中国、日本和美国拍摄的录像，也再次重温了托宾等人在1987年拍摄的录像。记得2004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专家们在会场上观看了托宾等人拍摄的录像，他们对中国的录像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当场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文化是最不容易改变的，文化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在许多情况下，学前教育工作者在思考学前教育问题时，往往容易忽略对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从而会导致决策和行动中出现很多问题。我相信《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书的出版，会给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带来很大的启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书出版伊始，适逢美国著名课程专家加州大学麦克尼尔教授前来我校讲学，他知道我从事的是学前教育研究，就向我推荐了当时《哈佛教育评论》上登载的对这本书的推介文章，特别是对该书的研究方法的介绍。一周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我的美国朋友，长期从事教育生态研究的麻省大学戴维·戴教授给我寄来的这本书，他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在这以后，在我所看到的文献中，我也曾许多次地看到了它们都将这个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典范。在这次出版的修订本中，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又作了拓展，增加了历史的线索，进一步丰富了质的研究方法。

我期望这本书会给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带来新的思考，能帮助他们更宏观、更理性地思考我国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朱家雄

2013 年 8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逸夫楼

中文版序二

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让我非常兴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和同事吴燕和首次在中国进行学前比较教育研究，继而在 1989 年发表了这项研究的著作《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日本、中国、美国》。之后很多年我都对再添续作不以为然。但到了 1999 年，薛烨使我看到中国和中国学前教育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那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已经过时，这也让我意识到开展后续研究的时机到了。自从 2001 年我们开始新的合作研究以来，中国的教育界及其整个社会一直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发展变化着。

在千禧年的头十年间，这样的迅猛变化使我们感到，在中国的学前教育研究既令人兴奋也面临诸多挑战。要研究一个快速变化的事物，无疑十分困难！从 2001 年至 2008 年，我们先后在中国的幼儿园摄制录像，与中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做访谈。每年我们会回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研究；而每次我们都会发现很多变化。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之前的发现和认识。现在说起来，没有较早完成这本书也是件好事。直到研究的最后一年，我们才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变化比我们当初的理解要复杂得多。那时，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学前教育正沿着一条虽不是平稳持续的但仍是线性的轨迹发展：逐步强调西方的那种以儿童为中心、基于游戏的建构主义教学法和课程。但到撰写本书后期，基于对多位中国的学前教育专家的访谈，我们重新订正了结论：中国的教育仍然是朝上述方向发展，但有证据显示它同时也愈加重视本土文化价值，回归中国传统教学理念和实践活动。

在本书中，我们研究了经济、人口、政治的变化对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学前教育的影响。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这些强有力的变化会被我们所说的隐涵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所制约。幼儿园不仅能反映其所处的文化，更是文化再生的重要场所。从我们开始“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研究算起，已经快有三十年了，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尽管这样我们的研究显示每个社会中幼儿园的教育方法仍持续不断地反映了该社会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传统价值观。即便在当代，中国的幼儿园仍培养幼儿学

做中国人，日本的幼儿园培养日本人，而美国的幼儿园造就美国人。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幼儿园按照官方的要求为那些移民父母的年幼儿童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在日本，幼儿园被要求传授给幼儿日本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本人认为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变革中正悄然消失。在中国，不少人渴望幼儿园成为培养新全球经济中成功者的摇篮。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幼儿园的目标同时应是培养中国人。

鉴于当代中国持续的变革及其复杂性，要是再等二十年才做下一轮后续研究显然是不明智的。我对中国明天的发展翘首以待，也准备积极参与新的后续研究。但我深知，将来国内的和国外的年轻同事将接手把这项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美国乔治亚大学　约瑟夫·托宾

2013 年 7 月

译者序

美国的学前教育体系和中国的有很大不同。我们习惯中所说的幼儿园在美国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五岁以下学龄前幼儿上的班(preschool)；二是专为五岁幼儿提供的学前班(kindergarten)，直译为中文的幼儿园，其实称之为“小学预科”也不过分，与国内的学前班或大班相似，仅一年而已，但也有很大差别，因为美国的学前班大部分都设在公立学校里面，是免费的。但是，日本的幼儿园有两种：幼稚园和保育园，他们的做法则和中国的相近，这与日本在晚清年间向中国输出幼儿园理念、规章和课程有关。为了国内读者方便，我们把 preschool 通译为幼儿园或幼儿教育机构，其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译为园长。

与此类似，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或 preschool education 也常有不同翻译，如早期教育、学前教育、幼儿教育。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多有交替使用，泛指三岁到六岁之间的儿童教育。

本书的作者在书的开始部分就提到他们首先是以美国读者为对象而撰写此书的。因此，有些关于美国的文化背景和常识，叙述上时不时从略。我们在翻译时对一些地方做了些调整。例如，在介绍阿尔罕布拉幼儿园时提到其资金来源，原文把 Block Grant 一带而过。这种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给地方政府为社会福利社区建设做支配使用时，没有很多限制。考虑到国内读者未必知道这类美国政治、经济和幼儿教育等背景情况，我们为书中个别类似的背景信息添加了脚注。

为了读者能够查阅书中引用的各种英文资料，所有原作者的名字和出版年份都用括号保留在译文中。有些国内不常见的英文或日文术语(用英文拼写的)，也都在中文版里做了保留。如有必要，读者可以进一步核实所引用术语或段落。

在翻译过程中，偶有遇到排版或别的原因造成的不准确的地方。经与作者核实，我们逐一作了更正。例如，大观幼儿园从建园至 2007 年已有八任园长，而不是英文本中的三任园长。

除了本书的主要译者之外，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刘璐、郝俊、张慧、黄琦睿对译稿做了大量校对工作，提出了细致的修改意见。中国河南大学的王峥和山东英才学院的宋占美做了不少前期翻译工作。四川西南大学的苏贵民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杨艳通读了最后的译稿，提出宝贵意见。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婕帮助联系出版，并对最后的校样进行了仔细的校对和修改，使这本译作能按计划出版。同时，我们还得到了车艺和林安希子两位同事的修改建议和多方协助。特别是林安希子，在我们翻译日本一章的时候有求必应，对全书中的日文人名片假名的使用给予了指导。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本书作者托宾教授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译者大力支持，薛烨审阅了译稿全部内容。同时，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施煜文的辛勤劳动，使译文达到出版要求。

前言

1989年，我与我的同事吴燕和(David Wu)以及戴娜·戴维森(Dana Davidson)一道撰写了《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本书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项研究成果。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幼儿教育专家、幼儿家长、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各方读者的欢迎。同时，该书的出版也扭转了我当时举步维艰的学术生涯。此书出版之后的若干年中，我试图在这项研究成果基础上拓展创新，诸如“更多文化中的幼儿园”、“三种文化中的小学教育”、“三种社会阶层中的幼儿教育”等，但由于这些题目都不合适，我决定暂把“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这样的研究放到一边，先转向其他研究项目。许多年过去了，该书和配套的影像资料依然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在幼儿教育和比较教育领域中被广泛引用。在这项研究完成15年之后，我曾想修订此书，以期对它再做更新，但由于认为自己在思想和方法上的创新不足，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但是，1999年的一个下午让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那天我刚做完一个报告正在收拾东西，一个年轻人向我走来，他就是薛烨，他告诉我他刚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特别喜欢《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并让我看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录像。这仅仅几分钟的录像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自1985年以来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样看来，进行后续研究的时候到了。

看完录像后，我和薛烨就接下来可能进行的研究内容做了讨论。我很清楚，再次进行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做思想和方法上的重复，因为我们将要开展的后续研究将把历史发展维度纳入其中，而这在原先的研究中是没有的。先前的研究是跨文化，而新的研究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时空。因此，这就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当天下午，薛烨和我就共同合作进行“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后续研究达成共识，考虑着手组建了新的研究团队。在原先的研究团队中，我是美国人，但主要负责在日本的研究；中国人类学者吴燕和教授主要负责在中国的研究；而另一个美国人，幼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教育专家戴娜·戴维森教授主要负责在美国的研究，使得这一团队中有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但没有日本人。鉴于原先研究团队构成的不平衡，在新的研究中，薛烨接替了已经退休的吴燕和教授负责中国的部分，此外，我邀请了日本学者唐泽真弓(Mayumi Karasawa)加入，她主要负责在日本的研究工作；而我是美国部分的主要研究者，同时也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研究项目的每个环节，都是由薛烨、唐泽真弓和我共同商讨完成的。薛烨来自中国北京，他是孟菲斯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的教授；唐泽真弓是东京女子基督教大学的教授，比较心理学专家；我的学术背景是在人类学领域，但由于之前《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给我带来的声誉，使得我也自然而然转型成为幼儿教育专家。

随着研究的开展，我们三人一起到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里拍摄录像，共同对那里的教师和园长进行首轮访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别负责在自己国家中的组织、安排和接待。在访谈中间，我们轮流提问题，有时需要借助彼此进行翻译。薛烨能够流畅地运用英、汉两种语言，而唐泽真弓的日语和英语能力也同样出色。在日本进行访谈时，我尽量用不太娴熟的日语去提出问题并理解老师和园长做出的解释，但有时仍需要借助翻译。此外，我的中国博士生车艺和日本博士生林安希子(Akiko Hayashi)也做了大量的现场翻译工作。她们一方面转达我们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将对方的回答及时反馈给我们。在翻译被访者的回答和解释时，她们会尽量压低声音以免打断或干扰我们与被访谈者之间的对话。

本书出版之前，为了获得参与访谈的不同文化中幼儿教育人士对我们的初步文化诠释提供反馈，并弥补我们理解上的不足，我们又通过邮件和电话对他们逐一进行了后续的核实和进一步访谈。我们的研究团队在一起共同讨论、分析和解释访谈内容，并比较了三个不同文化中业内人士的观点，逐渐形成本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为保证各章节之间的连贯一致，最后由我主笔整合全书。

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全弘珠、菲克利叶·库鲁班(Fikriye Kruban)、车艺和林安希子参与了全程研究，他们都是幼儿教育方面用录像做民族志研究的专家。在参与每一阶段的研究的同时，他们也在准备发表各自的相关论文。

新的研究与先前研究一致，同样是对中、日、美三国的幼儿园教育进行比较。只是在方法上作了改进，使得幼儿园老师和园长有更多充分表达意见和给我们做讲解的机会。本书第一章阐述研究方法，介绍了我们是如何运用录像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帮助老师和园长进行反思，其中不仅包含幼儿园教育中的文化差异，并涉

及了幼儿教育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变化。之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章里，每一章分别讨论一个国家的幼儿教育，详细描述了每个文化中业内人士对中、日、美三国幼儿教育的自我认识和相互看法，包括对过去二十年各自幼儿园所经历的变化和传承进行解释。熟悉我们原先研究报告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这本新书中，各章节顺序较之先前有所变动，“中国部分”被提到前面的章节，与日本一章交换了位置。我们期望以此突出中国社会及其幼儿教育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当初着手撰写本书的初衷。同时，因为本书首先考虑的读者对象是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所以是用英文撰写的。这一安排和先前那本书一样，我们把关于美国的一章依旧放到了最后。这样做是按人类学研究常常提到的基本原则，即民族志研究旨在使自己觉得陌生、新奇的事物变得熟悉，然后使自己（美国人）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新奇。最后，第五章是研究的结论部分，我们讨论了三种文化中每个国家幼儿教育体系与其社会变化和文化传承过程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研究对理解这些关系所做的贡献。

我们在中国、日本和美国所拍摄的幼儿园每日活动的录像资料是本项研究所用方法的核心。在本书中，我们选用了大量的新旧研究录像的截图进行对比，使得对每一种文化中幼儿教育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变化的描述更为生动、形象。如先前《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样，我们将录像资料制作成六个幼儿园各成一集有画外解说的影片，收录在 DVD 光盘上，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我的网站 joetobin. net 订购。

最后，我想谈谈由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的术语不一致问题。在本书中“大观幼儿园”通常应被英译为“Daguan Kindergarten”。但是，与前一本书相同，在本书的英文版中我们没有把中文的“幼儿园”和日语的“幼稚园”翻译成“kindergarten”（学前班），因为在大多数西方使用英语的国家，“kindergarten”是指小学里为上一年级办的预备班，而不是指为三至六岁幼儿提供的教育保育机构。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四岁的幼儿，他们所在的教室多设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服务机构中，而非正规小学。在中国，四岁幼儿进入的“kindergarten”指的是幼儿园而并不是英语意义中的“kindergarten”（学前班）。中国幼儿园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有些是寄宿制幼儿园。而在日本，四岁幼儿进入的有“幼稚园”，也有“保育园”，我们把这些机构翻译成“日托中心”。在美国，四岁幼儿可进入各种学前教育机构，其名称也多种多样，包括幼儿中心（children's center）、婴幼园（nursery）、日托中心（daycare center）和早教班（preschool）。对这些不同国家、文化和语言中翻译幼儿保教机构名称的难题，目前我们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因此本书当中，涉及每个国家的章节时，我们不翻译而直接使用该国习惯表达；而在跨国家

联系对比时，我们用英文里常用名称“preschool”(学前教育机构)[中译本通译为“幼儿园”]。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深入这些术语背后，让读者能够详细地了解这三个国家中幼儿教育工作者是如何理解各类幼儿教育机构，理解这些机构提供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本书中，我们在日本老师名字后面加上“先生”(sensei)，在中国的老师姓名后面加上“老师”，而对美国的老师则直接用名字来称呼。这是因为在各自的国家里，这些是教师的同事和所教的幼儿日常所使用的称呼。

本次研究主要得到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的资助。我们特别感谢在这三个国家中允许我们在其幼儿园里拍摄录像的园长和老师们。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地向我们解释了他们对录像中拍摄到的教育实践所隐含的理念。本研究的主要合作者有日本京都小松谷保育园的吉泽秀则与吉泽纪绘两位园长，森田千里老师、野上隆也老师；东京真荼香幼稚园的町山芳夫园长与贝塚万里子老师；中国昆明市大观幼儿园的石永红园长、谢平副园长，中班的张瑞、董艳云和杨佳三位老师，已退休的王兴兰和吴琼珍园长；上海市思南路幼儿园的郭宗莉园长，中班的王健和成锦秀老师；美国檀香山圣提摩西儿童中心的德洛瑞丝·布洛克曼园长、珍妮·梅田和瓦尔·莫利瓦基老师；凤凰城阿尔罕布拉幼儿园的邦妮·隆德园长，弗兰·史密斯、伊娃·兰热尔老师。还有日本京都泉山幼稚园的熊谷簗子园长，25 年前，她接受了我儿子山姆在她的幼儿园里就读，如同二十年前一样，在本次研究中，她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日本幼儿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看法。

同时，我们的研究得到日本的小田丰、秋田喜代美、门田理世、铃木吉米、芦田宏和杰弗里·马瑞的大力协助，为此，我们十分感激。此外，中国的冯晓霞、李红、朱家雄、华爱华、苏贵民、周宗奎和曹能秀等教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详细地给我们解释了他们对中国幼儿教育改革的看法。我们衷心地感谢北京、长春、重庆、昆明、上海、武汉、西安和一些中小城市的老师、园长、研究人员和家长们，他们对“三种文化中幼儿园”的录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职业经历。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陈思帆和她的同学们为我们大量的访谈资料做了转录，这些研究生是王娟、李恒、李瑛、朱婷婷、刘珺珺、刘朝莹、孙晓军、张阳阳、陈向丽、赵冬梅、郑莹、常保晶、谭雪晴、谭静和熊莉。韦国庆和尾花真希在孟菲斯大学承担了大量的文件组织整理工作；阿娜萨·沃茨和芭芭拉·桑德林协助我们收集了美国访谈的部分数据；张开冰协调了在中国东北部的访谈数据收集工作。玛丽·麦可马林、卡里·布泽蒂、里奇·约翰逊、斯蒂芬妮·菲尼和兰尼·奥为美国部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玛丽

和卡里两人，还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尔·本阿瑞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婕对我们的手稿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丹尼尔·沃尔什和海迪·罗斯作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审阅专家为我们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书稿得到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出版社的伊丽莎白·布兰奇·戴森在书稿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及时的鼓励、建议和不可缺少的指点。迈克尔·科普洛对我们的文稿进行了仔细的编辑。我的儿子艾萨克·托宾设计了本书的封面和书内的版面设计。

最后，感谢我们的家人贝丝·托宾、凯瑟琳·基茨曼和北山忍，对我们远离家乡进行研究所给予充分理解，又为我们回家埋头工作给予诸多支持。

约瑟夫·托宾

图 1.1　大观幼儿园现任和历任园长与托宾、薛烨及唐泽真弓在幼儿园旧址前合影。

目录

中文版序一 / 1
中文版序二 / 3
译者序 / 5
前言 / 7

第一章 引言 / 1
第二章 中国 / 20
第三章 日本 / 81
第四章 美国 / 135
第五章 跨越时间和文化的思考 / 196

参考文献 / 21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